

略论先秦诸子典籍的史学价值

刘 重 来

先秦诸子的著作，经西汉末刘向、刘歆整理，载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有 140 家，而流传至今的，不过 20 余种，其中主要有《管子》（管仲）、《邓析子》（邓析）、《墨子》（墨翟）、《老子》（老聃）、《文子》（老子弟子）、《关尹子》（关尹喜）、《列子》（列御寇）、《杨子》（杨朱）、《商君书》（商鞅）、《申子》（申不害）、《尸子》（尸佼）、《公孙龙子》（公孙龙）、《庄子》（庄周）、《慎子》（慎到）、《尹文子》（尹文）、《荀子》（荀卿）、《鹖冠子》（楚人）、《鬼谷子》（纵横家）、《亢仓子》（庚桑楚）、《韩非子》（韩非）、《吕氏春秋》（吕不韦）等等。

先秦诸子之书在古代图书分类中并没有列入史部，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然而我国的历代史家在治史中却十分重视这些著作，甚至不少史家仍把它们当作史学著作对待。如《管子》一书，著名学者赵俣生先生就说过：“我倒觉得，把它当作‘史部之书’，仿佛更实际些”。（《〈管子〉书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而当今不少史学要籍介绍之书，不仅把孔子作为中国第一位史学家来论述，而且把先秦诸子的不少著作当作史书加以论述。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先秦诸子之书中有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又内涵对后世史学有启示意义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

(一)提供了先秦时期真实可靠的史实

先秦诸子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时,不是空谈抽象的道理,而是常常取证于历史。因此他们的著作就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史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可见,先秦诸子为了使自己的学说立住脚,为了能取悦于统治者,为了能在争鸣中取胜,他们在求证于史时自然会尽力求实求真,以使自己宣扬的学说基础牢固,否则,必然会遭到对立派的揭露和反驳。如《吕氏春秋》160篇,“差不多每篇都引证有历史故事,若是这些故事出于伪造的话,那么当悬之国门的时候,诸侯国的游士宾客,未见得就不敢提出纠正。因此也可以推断《吕氏春秋》一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李宗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书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由此也可概见其他先秦诸子之书征引史料的真实性。

另外,先秦诸子们毕竟去古未远。他们在世时,社会上还流传着大量古代传说,而上古社会留下的文化遗址还随处可见,中原之外的一些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之中,这些都为诸子们谈古论今提供了较可靠的参验对象。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进程,能够作出较准确的判断,对后世历史研究不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如关于远古社会的状况,《庄子·盗跖篇》中记载说:“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韩非子·五蠹篇》中也有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这些记载，真实地描绘了远古时代人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合乎远古人类进化的历史规律的。如“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吕氏春秋·恃君览》），“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正是远古群婚制下社会状况的写照。又如《墨子·辞过》所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从今天考古证明，人类早期确实曾有过穴居时代。有些记载，如“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君览》），“男女倂居，不君不臣”（《列子·汤问》），正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状况。

又如《庄子·盗跖篇》所记春秋末年“跖”这个人物领导的奴隶起义之事：“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此事在《孟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都有记载，可知是有一定根据，近代史书在记春秋时期阶级斗争状况时都纷纷加以征引，可见其真实性和珍贵性。

又如关于大禹治水之事，《庄子·天下篇》有较详细的记载：“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生动地描绘了大禹治水的情景。对此，其他子书也有类似记载，如《韩非子·五蠹》中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论语·泰伯》中记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再和《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洫”等对照，可知这些记载具有很高的真实性。而《韩非子·说疑》及《墨子·兼爱下》、《墨子·非攻下》关于禹

因治水有功，声威大振，通过武力自己当上部落酋长，又打败了南方三苗部落赫赫战功的记载，也多被后世史书作为珍贵史料征引。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商汤逐渐强大后，先后灭掉十几个部落或小国，居然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战绩。《荀子·儒效》记载了周武王克商后实行分封制，利用血缘纽带来加强统治，在周初分封诸国时，“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这里提到的周初封国数及姬姓独居数字，成了研究周初封国的数字根据而被广泛引用，可见其史料之珍贵。《孟子》一书中有些记载，如“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请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等，都是研究先秦土地制度的珍贵史料。

在土地问题上，《管子·乘马》中记载了西周统治者制定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用抽取租税的办法进行剥削的“分货”授田制。《吕氏春秋·悔过》记载了魏文侯时李悝的变法内容，如“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邲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即李悝估算了魏国的可耕地面积和人口，根据土地好坏分给农民一百亩或二百亩。而受田的农民要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承担各种劳役。《荀子·议兵》则记载了魏国改革军制的内容，《韩非子·定法》等篇记载了商鞅变法之事。

先秦诸子站在不同的立场论述自己的学说，因而对历史史实的记述也有侧重。如孟子是主张“法先王”的，因此他的主张多以先王政治作为论据，从而侧重记载了不少古代传说时期的政治演变历史；而荀子主张“法后王”，因而书中多举战国时期的现实为例证。如《荀子·议兵》对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勇士作了详尽的分析，是不可多得的战国时期各国军事实力对比的珍贵史料，不仅被后世史家用来说明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且用来作为论证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的子书对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也提供了重要史料。如《韩非子·有度》提到的“司南”，是指南车、指南针的前身，证明早在公

元前三世纪,我国就能利用磁石指示方向了。而“我们从《管子》书中,可以看到古人对矿山金属知识的积累……可以看到盐的制造和出卖……可以看到古代商业资本发展的种种情节……可以看到中央集权的初步成长”等等,“它在先秦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赵俪生《〈管子〉书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有些子书还可以与其他史书互证互补。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对于吴起为什么有“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之举,没有说清楚。而在《韩非子·和氏》中就清楚地作了回答,原来是因为旧的贵族势力太大,人数太多,要废除,就要取消他们的特权。不如此记载,就不会明白吴起变法既然使楚国得以强大,而楚国的贵族为什么还会反对他。

总之,先秦诸子之书的宗旨不是写史,但为了阐明自己的学说而取证于历史,从而使子书中有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为建立古代史学理论打下了基础

先秦诸子为了阐明自己的学说,不仅千方百计地去寻求理想的历史榜样,而且又以其宣扬的历史榜样来论证自己的学说和理想政治。因此,他们所追求、宣扬的历史榜样,他们对天人关系,对人类社会和国家起源,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和优劣的评价,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认识等等,都体现了各不相同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从整体上说,几乎确定了我国古代社会历史观点的全部基本范畴,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如天人关系问题,这是商周时代社会意识的核心问题。儒、道、墨、阴阳诸家虽然已注意到人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仍然依赖用“天命”来解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生的问题。他们把“星坠”、“木鸣”等自然现象说成是上天的告诫或惩罚,宣扬“国家将兴,必有祲

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唯心主义说教。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天命思想逐渐动摇，唯物主义天道观有了发展，从而推进了从人类历史本身去认识历史进程的各种问题。荀子就认为天是一种客观存在，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在《天论》中说，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对人事的决定作用，他明确指出“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治乱非地也”。

先秦诸子在阐明国家起源和历史发展时，也表露出了较鲜明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如商鞅就把古史分为“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在《商君书·开塞篇》中，又将古史分为“上世”、“中世”、“下世”，总结了大约相当于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阶段的政治特点：“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努力从客观的历史进程去认识历史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能注意按不同时期的特点给予阶段性的划分，这对后世史家分析历史发展阶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历史进程的认识，先秦诸子的见解对后世史家也有很大影响。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而且代代相续，即承认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礼制在不断发展，历史在代代相续。而孟子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他以简单的数字（五百）来论证历史的必然变更。而比孟子稍后的邹衍则把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与历史进程的某个时期次第对应起来，创造了“五德终始”的历史观，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按五行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往复循环的。他认为黄帝是土德，夏是木德，

殷代夏，是金德代木德，周代殷，是火德胜金德。并预言代周的必是水德。他的这种历史循环论，对后世影响很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以水德自居，并以此作为立国的基本理论，制定了一整套相应的冠服礼仪制度。

先秦诸子在统治方法上的主张和对统治者的评价，对于后世史家也有着重要影响。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仁者爱人”主要还是作为伦理道德中的一个命题，但却为以后民本主义思想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孟子则把“仁”运用于政治，提出了“仁政”的纲领，把“仁政”作为维系封建社会各种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他宣扬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民本思想对后世统治者及后世史家都有很大影响。孔子强调的“为政以德”，自汉代中国封建制度全面确立之后，历代比较开明的帝王，都把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汉代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仁德政治的实践结果，成了史家评判封建统治政权的标准，在史学上起了很大影响。而墨子反对诸侯混战，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强暴欺凌，荀子主张礼治，韩非子强调法治，庄子反对政治干涉和社会更张，老子提出治国“无为”原则，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提倡法治，名家主张名正言顺等等，都对后世史家的历史观有重大影响。

（三）对后世史家治史的指导意义

1. 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

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先秦诸子由于处在春秋战国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面对国家分合，生民休戚，制度得失，人物善恶的变幻无常，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在他们的著作里，大量征引历史故事，不仅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且是想以史为鉴，总结教训，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孔子熟悉历史，“信而好古”，又十分注意时政，他游历各国，所到之处，“必闻其政”（《论语·学而》）。他私人讲学，谈古论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都是把经世致用作为宗旨。为了宣扬其“仁政”、“德治”主张，他广泛搜集虞、夏、商、周四代史料，整理修订成《尚书》。他针对当时“世衰道微”的状况，又编定了《春秋》，企图以“正名”的方法，使乱臣贼子惧。孟子对孔子修《春秋》是为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经世匡时之“义”十分理解，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左传》也一再称颂《春秋》具有“惩恶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经世作用。孔子的《论语》，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更道出了其经世致用的深远影响。

孔子治史的经世精神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之后，历代史家都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们一方面对孔子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积极的阐发，一方面又在其治史实践中加以应用。司马迁热烈赞颂孔子的《春秋》：“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公开表明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以后班固撰《汉书》，杜佑写《通典》，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都是继承和发扬孔子的经世精神。

2. 求实精神

秉笔直书，求实求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史家，首先关注的是史学的记实功能。先秦诸子赞赏董狐、崔杼等不畏强权，“书法不隐”，甚至因秉笔直书不惜牺牲性命的史官为“古之良史”，而他们自己在讲学治史中也重征信重参验，求实求真。孔子主张“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他对上古三代的历史已不太清楚了，因而在讲学治史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

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里,孔子说明他之所以“能言”夏、殷之礼,是因为有其文献可以征引,而杞、宋之礼他之所以不能言,是因为其文献不足。可知重实证,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孔子起了重要作用。荀子受其影响,也认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辨合,有符验”(《荀子·性恶》)。荀子提出的“辨合”、“符验”,是孔子征之于文献思想的发展。而韩非更发展了孔、荀的思想,提出了“参验”的主张。他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韩非认为尧舜不复生就不可能定“儒墨之诚”虽不尽正确,但他提出“参验”作为辨别事物,包括治史的看法,却是很有意义的。而《吕氏春秋·察传》则更把“参验”提到了从理性认识的高度。认为“夫得言,不可以不察……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这里,“其于人”,就是首先要了解传言的是什么样的人。“验之以理”,就是要在道理上看是否说得过去。这种求实求真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应该说,先秦诸子重征信,重参验的治史思想,对中国史学求实求真的优良传统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3. 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史家的优良品质。而这种精神和品质,可以从先秦诸子在著书立说中提出的“尊疑”、“传疑”、“阙疑”等主张中表现出来。

中国历史悠久,历史记载时间长、范围广,在代代相传中,难免会有人为的改动,“层累”的增添和反复的重塑,还有历代统治者别有用心的歪曲、掩饰和伪造,加上因战争、灾害造成的史料残缺和颠错,以致久远的历史往往会出现以讹传讹,甚至面目全非的状况。这就要求史家在治史中应有敏锐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

孔子在讲学治史中,虽然“信而好古”,但并不因循守旧,抱残

守缺。他主张“尊疑”、“善疑”、“阙疑”、“传疑”。他认为“君子有九思”，其中一种就是“疑”。他主张“疑思问”（《论语·季氏》），意思是，有疑问就要积极去请教、钻研。对那些值得怀疑但又一时不能释疑的问题，则要保留下来。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这些话，表现了孔子“尊疑”、“阙疑”的思想，即遇到不清楚，有怀疑的地方，切忌主观武断，匆忙下结论；对于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自己仍然解决不了，就实事求是，“疑以传疑”（《左传》庄公七年）。孔子的怀疑精神，对后世史家治史有很大影响，司马迁不仅把“尊疑”、“阙疑”、“传疑”作为治史原则，而且在撰写《史记》时，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就。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多次提到“疑者传疑”（《史记·三代世表》）和“疑者阙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实际上就是孔子怀疑精神的弘扬和实践。

孔子的弟子们也不盲从古史，如古史中记载殷纣王如何坏，子贡却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孟子对于《尚书》所载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表示怀疑，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的这段话，尽管对于那场战争的残酷性的怀疑有不一定正确的地方，但他不迷信书本，敢于提倡怀疑和反思，却对后世史家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总之，先秦诸子的著作，虽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目录学家们也是把这些书放入经部或子部而没有列入史部。但这些著作所反映的历史观、史学思想、治史方法以及内涵丰富、珍贵的史料对后世史学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孕育代表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从思想内容到编写体例都比较完备成熟的史学著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大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